

散文选刊

创刊 30 年散文精选集

葛一敏 乔叶◎主编

人情意

浮世悲欢

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 |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羡林 | 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冰心 | 怀念曹湜巴金 | 冒中 | 慈母和我的书梁晓声 | 我与父辈阎连科 | 书祭舒婷 | 平常的沈从文黄永玉 | 霞落燕回余秋雨 | 可爱的老头们白岩松 | 非如此不可？非如此不可！柴静 | 一个尘封垢理却愈见光亮 | 怀念孙犁先生铁凝 | 落红萧萧为哪般迟子建 | 写给儿子的一封信蔡春猪 | 爱无葬身之小伙子胡安西李娟 | 想起一些人邹静之 | 在水上跳舞的石头乔叶 | 伊甸之子项小米 | 谁说 | 章含之 | 祖父是一粒粮食陈原 | 父亲不说话徐迅 | 故里三丑周同宾 | 一代人中的一个赵鹭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散文选刊

创刊 30 年散文精选集

葛一敏 乔 叶◎主编

浮
世
悲
欢

人间
情意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世悲欢 / 葛一敏, 乔叶主编. — 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13.6
ISBN 978-7-5477-0969-6

I. ①浮… II. ①葛… ②乔… III. ①散文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46134号

浮世悲欢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: 100005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-8043

网 址: www.beijingtongxin.com

印 刷: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: 23.5

字 数: 250千字

印 数: 8000

定 价: 29.80元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[目 录]

第一辑

落红萧萧为哪般

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	冰 心	002
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	季羨林	013
怀念曹禺	巴 金	023
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	梁 衡	027
平常的沈从文	黄永玉	045
怀念孙犁先生	铁 凝	051
门 孔	余秋雨	058
落红萧萧为哪般	迟子建	069
可爱的老头们	白岩松	074
吴先生，请开门	赵李红	077
凤求凰	蔡小容	085
秋白，1935	徐海蛟	090
王府大街64号	雷 达	099
霞落燕园	宗 璞	106
谁说草木不通情	章含之	112
祭马思聪文	徐 迟	125
非如此不可？非如此不可！	柴 静	128
长城岭上的歌声	秦兆阳	135

第二辑

生命中那些难忘的眼神

多年父子成兄弟	汪曾祺	144
我与父辈	阎连科	147
日不落家	余光中	152
慈母和我的书	梁晓声	159
丧 乱	王朝阳	165
陈干娘	范若丁	177
呼 唤	李天芳	181
雨中驶来的马车	谢明洲	186
祖父是一粒粮食	陈 原	190
伊甸之子	项小米	194
关于父亲母亲的几件小事	星 星	201
致亲爱的母亲	庞余亮	208
回忆父亲	李汉荣	215
父亲不说话	徐 迅	225
外祖母的床	张巧慧	230
生命中那些难忘的眼神	陈莉莉	238
写给儿子的一封信	蔡春猪	242
爱无葬身之地	刘 瑜	248
指缝里的白烟	蒋 蓝	252
听 潮	石方能	258

第三辑

一代人中的一个

书 祭	舒 婷	270
祭幺婶文	周同宾	275
故里三丑	周同宾	281
我的第一个老师	王充闾	290
小小伙子胡安西	李 娟	297
木工叶子扁	苏 北	302
在水上跳舞的石头	乔 叶	305
小席走了	阿 舍	310
石 福	黄宏地	318
老何家	范若丁	321
一个故事	一 平	326
王 勇	李傻傻	333
乡人轶事	胡亚才	337
一代人中的一个	赵 鹭	342
故乡人物	冯剑华	348
想起一些人	邹静之	353
段先生	吴 然	358
外教比尔	张 莉	360
童年的阿三	梅 洁	364

第一辑

落红萧萧为哪般

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

文_冰 心

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4月24日写的。七个月过去了，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催，我总是写不下去！“七七事变”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，总使我胆怯心酸，不能下笔——

说起我和文藻，真是“隔行如隔山”，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，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他那“顶天立地”的大书架擦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、人类学的书，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。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，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，以及他在1982年应《晋阳学刊》之约，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的“自传”。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：他自有生以来，进的什么学校、读的什么功课、从哪位老师受业、写的什么文章、交的什么朋友，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、培养的哪些学生……提到我的地方，只有两处：我们何时相识，何时结婚，短短的几句！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，竟是只字不提。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，都说：“吴师曾感慨地说，‘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，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。’”

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《自传》，但也应该用他《自传》的话，来总结他在“七七事变”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：一是讲课，用他学生的话说是“建立‘适合我国国情’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，使‘中国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’”。二是培养专业人才，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，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（“请进来”和“派出

去”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)。三是提倡社区研究。“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，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”。我只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，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，现在这几位都是知名的学者和教授。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！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些年的“茫然的目光”和“一股傻气”的后面，隐藏了多少的“精力和心思”！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，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。上面的七句是：

马
香丁
羽毛纱
样样都差
傻姑爷到家
说起真是笑话
教育原来在清华

“马”和“羽毛纱”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，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，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马（一种点心），孩子不会说萨其马，一般只说“马”。因此他到了铺子里，也只会说买“马”，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。他到了“稻香村”点心店和“东升祥”布店，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。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，和我家都熟，都打电话来问。“东升祥”的店员问：“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？”我们都大笑起来，我就说：“他真是个傻姑爷！”父亲笑了，说：“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！”我也只好认了。抗战后我们到了云南，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，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华身上。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：

冰心女士眼力不佳

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

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，我又只好认我的“作法自毙”。

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。“七七事变”后这一年，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，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，那时还不受干扰。但我们觉得在敌后一刻也呆不下去了，同时文藻已经同敌后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，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，由他去教学。那时只因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，她要11月才出世，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。这一年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——这一段我在《丢不掉的珍宝》一文中写得很详细。

1938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，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，然后经香港从安南（当时的越南）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。这一路，旅途的困顿曲折，心绪的恶劣悲愤，就不能细说了。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，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，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，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！

用文藻自己的话说：“自1938年离开燕京大学，直到1951年从日本回国，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。”

他到了云南大学，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，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，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“实地调查工作站”。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，又有日机轰炸，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，住在华氏墓庐，我给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“默庐”，我在1940年2月为香港大公报（应杨刚之约）写的《默庐试笔》中写得很详细。

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。他每到周末，就从城里骑马回家，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，如称为“三剑客”的罗常培、郑天翔和杨振声。这些苦中作乐的情况，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的《蜀道难》序中，也都描述过了。

1940年底，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，不能继续，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，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，负责研究边疆的民

族、宗教和教育问题，并提出意见。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。

到了重庆，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，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，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。我把它叫做“潜庐”，关于这座土屋和门前风景，我在《力构小窗随笔》中也说过了。

我记得1942年春，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，我陪他在山下的“中央医院”也就是“上海医学院”的附属医院，住了将近一个月，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，据钱主任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，必有一个转折期，那时才知凶吉。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！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，惊惶而悄悄地来告诉我说“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”，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宿舍里去找王鹏万大夫夫妇——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——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，连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！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，看见文藻的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起来了，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，我想他一定“完”了！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，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。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，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。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迸出一身冷汗。大夫们都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，说：“这转折点终于来了！”又都回头对我笑说：“好了，您不用难过了……”我一面擦着脸上的汗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什么都慢！”

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，那时没有公费医疗，多住一天，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，我这个以“社会贤达”的名义被塞进“参政会”的参政员，每月的“工资”也只是一担白米。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，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，作为病后的补品。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，误加了白盐，我又舍不得倒掉，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！

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，说5月1日是她的生日，富奶奶（关于这位高尚的人，我将另有文章记述）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

头。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，看到爬到他枕边的、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、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（这也是富奶奶给她打扮的），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！

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。1943年初，他就参加了“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”去到印度，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。同年的6月他又参加了“西北建设考察团”，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。1944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“战时太平洋学会”，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。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、耶鲁、芝加哥、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，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，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“行为科学”的研究已从“社会关系学”发展到了以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。

1945年8月14日夜，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。那时在“中央大学”和在“上海医学院”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，都高兴得热泪纵横。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，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，直到1945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。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，1946年初，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，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，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。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，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，做专题研究，如日本天皇制、日本新宪法、日本新政党、财阀解体、工人运动等等，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，没有友好往来之前，趁这机会去日，倒是一个方便，但他只作一年打算。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，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，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1946年10月的《无家乐》那一篇文章里。当年的11月，文藻又回来接我，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在东京的一段时间，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。文藻利用一切机会，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。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

和一些妇女界人士，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。

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——谢南光同志，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，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。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，并和国内有了联系。文藻有个很“不好”的习惯，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，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、月、日。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，如军统、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。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仁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，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，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，溜到我们住处，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《论持久战》。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，他已走远了。

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——他是横滨领事，对共产主义同情的，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，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。1950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，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，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，只有记者和商人。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，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，取得了《星报日报》记者的身份，在东京停留了一年。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，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，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！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，不是向东，而是向西到了香港，由香港回到了祖国！

这里应该补充一点，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，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，便也先后到了日本。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，高中毕业后，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，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他到美国去。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，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。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，回到北京。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，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，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——文藻的母校。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，仍由香港方面转。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，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，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。

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！1951年至1953年之间，文藻都在学习，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。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，这段事我在1976年写的《永

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》一文中叙述过。

1953年10月，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，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。文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。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“民族志”研究室的主任。他极力主张“民族学中国化”，“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，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”。这段详细的情况，在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1986年第2期，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《论吴文藻的“民族学中国化”的思想》一文中，都讲得很透彻，我这个外行人，就不必多说了。

1958年4月，文藻被错划为右派。这件意外的灾难，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！因为在他的罪名中，有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一条，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，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，写了许多张纸！他一面痛苦地挖着，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，“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我到国外去反好了，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？”我当时也和他一样“感到委屈和沉闷”，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，我只鼓励他好好地“挖”，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，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，他心里就更乱了。

正在这时，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，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。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，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，说：“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，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……”我一见到邓大姐，就像见了亲人一样，我的一腔冤愤，就都倾吐了出来！我说：“如果他是右派，我也就是漏网右派，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，但决没有‘反党反社会主义’的思想！”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。他在《自传》里说“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，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”。1959年12月，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。1979年又把错划的事予以改正。

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看到1957年，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，在他以后，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

人士，也都被划为右派，这其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。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。原来被划为右派，在明眼人的心中，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！

文藻被划成右派后，受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，并剥夺了教书权，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。1959年以后，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，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，发表了也不署名，例如从1959到1966年期间与费孝通（他已先被划为右派！）共同校订少数民族史志“三套丛书”，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书名著，为《辞海》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等，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，以及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。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、地理、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，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！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了，我和他一样，靠边站，住牛棚，那时我们一家八口（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）。分散在八个地方，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。他在1969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，1970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，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，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。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，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！实话说，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，到了“十年浩劫”，连国家主席、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，像我们这些“臭老九”，没有家破人亡，就是万幸了，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，无论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。如种棉花，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，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，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，也流了不少汗水。湖北夏天，骄阳似火，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，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，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，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，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。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句中的甘苦，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，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！

1971年8月，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、邝平章等八人，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，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。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《六次危机》的下半部分。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·穆恩、韦兰合著的《世界史》，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

文豪韦尔斯著的《世界史纲》，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“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”的大作！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，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，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。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，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，最宁静、最惬意的日子！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，伏案疾书，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，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。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，十二时回家午饭，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，下午六时才回家。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，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！现在回想起来，也亏得那时是“百举俱废”的时期，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，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后，各科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，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。1979年3月，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会的座谈会，作了“社会学与现代化”的发言，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。当年秋季，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，并在集体开设的“民族学基础”中，分担了“英国社会人类学”的教学任务。文藻恢复工作后，精神健旺了，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，就特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。1981年底，他写了《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》，介绍了西方民族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，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。

他在《自传》里最后说：“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，我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，我虽年老体弱，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做出贡献。”

他的信心是有的，但是体力不济了。近几年来，我偶尔从旁听见他和研究生们在家里的讨论和谈话，声音都是微弱而喑哑的，但他还是努力参加了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，校阅了研究生们的翻译稿件，自己也不断地披阅西方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作，又做些笔记。1983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，朝南的屋子多，我们的卧室兼书房，窗户宽大，阳光灿烂，书桌相对，真是窗明几净。我从1980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

右腿骨折，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。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，他写他的，我写我的，熟人和学生来了，也就坐在我们中间，说说笑笑，享尽了人间“偕老”的乐趣。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顾的丰硕果实。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这也是天然规律，文藻终于在1985年7月3日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，再也没有出来了。他的床前，一直只有我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的孩子们在守护，我行动不便，自己还要有人照顾，便也不能像1942年他患肺炎时那样，日夜守在他旁边了。1985年9月24日早晨，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：“爹爹已于早上6时20分逝世了！”

遵照他的遗嘱：不向遗体告别，不开追悼会，火葬后骨灰投海。存款三万元捐献给中央民院研究所，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。9月27日下午，除了我之外，一家大小和近亲密友（只是他的几位学生）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小厅里，开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（有好几位民院、民委、中联部的领导同志要去参加，我辞谢他们说：“我都不去你们更不必去了。”）这小型的告别会后，遗体便送到八宝山火化。9月29日晨，我们的儿女们又到火葬场捡了遗骨，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。等我死后，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，也是“死同穴”的意思吧！

文藻逝世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，我在《衷心的感谢》一文中（见《文汇报月刊》1986年第1期）都写过了。

现在总起来看他的一生，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，但他的“坎坷”是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“同命运”的。1986年第18期《红旗》上，有一篇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的文章：《引导知识分子坚持走健康成长的道路》中的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第四阶段上，讲得就非常地客观而公允！

第四阶段，从1957年到1976年。前十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“左”的偏差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，知识分子工作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。主要表现是轻视知识，歧视知识分子，以种种罪名